

理學的桐城、文學的桐城

——方宗誠及其學友與十九世紀的學術傳統建構*

丘文豪**

摘要

清代桐城因古文而聞名。桐城古文所倡導的「義理」，一般多不證自明地與程朱理學畫上等號。然而，十九世紀的桐城一地，程朱理學與文學間出現明顯的張力，而學界對此仍缺乏進一步的梳理與討論。本文將指出，桐城派內部作為「道」的程朱理學，以及作為「文」的文章寫作技巧之間的潛在張力，早已經存在於方苞、劉大櫟、姚鼐及其弟子們的言行之中，而十九世紀明道救世的需求更加劇了道與文的衝突。桐城蘇惇元、戴鈞衡與方宗誠等桐城派傳人，有意識地凸顯桐城程朱理學的一面，因此使得理學與文學、理學家與文士之間的張力浮上檯面。他們在敘述桐城學術發展，以及編纂桐城先賢著作與年譜時，刻意抬高理學並壓抑文學的獨立性。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儘管理學逐漸褪去影響力，但這股張力並未消失。桐城後人吳汝綸等人明白指出程朱義理與文章寫作之間的拉扯，並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兩者，試圖讓文學掙脫理學的枷鎖。透過描繪十九世紀理學與文學間如蹺蹺板般的關係，本文將指出桐城士人如何面對、安排與協調他們所繼承的學術傳統，並為清代學術思想史提供一個在「漢/宋」（考據/義理）與「傳統/現代」（新/舊）之外，理學與文學（義理/詞章）的研究角度。

關鍵詞：方宗誠、桐城派、桐城、程朱理學、文學

* 本文寫作期間，獲得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經費補助。本文初稿曾發表於「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論文發表會，感謝評論人蔡長林教授以及與會師友的評論與寶貴建議。同時，也向指導過本文的各位師長、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集刊編委會一併敬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4年1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8月23日。

**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一、前 言

桐城派一般被視為清代程朱理學的衛道者。他們秉持著「文以載道」的精神，打著「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¹的旗號，兼顧了古文寫作與程朱理學兩個面向。儘管桐城派前輩方苞（1668-1749）與姚鼐（1731-1815）等人，多有宣稱文學與理學同等重要的言論，但士人面對作為「道」的程朱理學與作為「文」的古文寫作之間，卻始終潛藏著拉扯。理學與文學的關係就像蹺蹺板一樣，難以達到平衡。十九世紀的桐城士人在緊迫的政教危機中，文學與理學孰輕孰重，更是他們面對桐城豐富且多元的學術傳統時，不得不認真看待的重大議題。乾嘉時期開始，「詞章」之學的自主意識更為強烈，甚至與經學家產生爭論。²同樣地，筆者也注意到，在時人不同語境中出現的古文、文辭、詞章、文章或詩文，其實也與義理之學產生衝突。³十九世紀桐城士人方宗誠（1818-1888）以及學友蘇惇元（1801-1857）與戴鈞衡（1814-1855）清楚意識到文學與程朱理學間的張力，並嘗試調整兩者之間的比重，凸出程朱理學的重要性與主導地位。從此可見，清代理學雖然少有理論發明，但仍在其他層面影響著時人的學術與思想生活。⁴清代學術思想史除了我們熟悉的漢宋之爭（義理 / 考據）外，理學與文學之爭（義理 / 詞章），也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角度。

¹ [清]蘇惇元，〈方苞年譜〉，收入[清]方苞著，劉季高點校，《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下冊，頁 870。本文引用之文獻，再引時適度節略作者、點校者、編者等。

² 張壽安，〈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學海》，2015 年第 2 期，頁 186-204。

³ 「文學」是一個內涵豐富，在歷史中不斷發展、演變，並與其他概念互相參照而成的概念。本文所指的「文學」，是聚焦於十九世紀桐城士人的語境中，相對於理學與考據學，偏向作文技巧與文章藝術性的辭章、文藝、文章、詩文等較為狹義的用法。王德威，〈導論：「世界中」的中國文學〉，收入氏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2021），上冊，頁 25、29-31；李爽學，〈八方風雨會「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0（2016 年 6 月），頁 151-177。

⁴ 關於清代理學史的整體狀況，請見龔書鐸主編，史革新、李帆、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全三冊。

傳統學術思想結構中，文與道本身即存在著複雜的競合關係。宋代《新唐書》的編纂凸顯了儒林與文苑的分界，理學的興起更拉大了兩者的距離。清代修史時，儒林與文苑的分類，也再次引起士人的焦慮與討論。⁵因此，理學與文學的密切關係，在近世思想史研究中並不是陌生的議題。⁶如李卓穎便曾討論過地方傳統建構時，理學與文學風尚的競爭關係。⁷此外，儘管稍嫌極端，也有學者強調理學與文學總是互相排斥，因此從「抵制」與「反抗」理學的角度，討論宋明文學的發展。⁸針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學者們反省並試圖突破「漢宋」的框架，因此注意到文學與文人。如蔡長林以「文士」概念切入的研究取徑，便相當值得借鑑。在清代少有嚴格意義下的理學家的客觀現實中，若援引「文人」概念探討相關的理學思考與行動，將有助於擴大我們對清代學術與思想的認識。⁹

在有關清代桐城派的相關研究中，有兩個內部張力長期遭到忽視。首先，學者其實已經注意到桐城派內部理學與文學的張力。如晚清民初的學者批評桐城派僅是以理學妝點門面，便暗示了桐城派兼具文學與程朱理學，但又不完全

⁵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8-13；蔡長林，〈從「文學」到「文人」——漢代「文章」的經學底蘊〉，《東華人文學報》，期 10（2007 年 1 月），頁 51-80。清代的討論，可見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頁 567-604；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⁶ 如包弼德（Peter K. Bol）從文學的角度，擴大對理學的研究。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並參考包弼德，〈美國宋代研究的近況〉，《新史學》，卷 6 期 3（1995 年 9 月），頁 193。另外，中國於 2001 年出版的大部頭《理學文藝史綱》，便是廣泛探討宋元明清文藝之學，如詩、詞、古文、小說、書、畫與理學的關係。許總主編，《理學文藝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⁷ 李卓穎，〈地方性與跨地方性——從「子游傳統」之論述與實踐看蘇州在地文化與理學之競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本 82 分 2（2011 年 6 月），頁 325-398。

⁸ 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6-10。

⁹ 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蔡長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蔡長林，《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契合的性質。¹⁰若干當代學者雖也論及理學與文學的搖擺與離合，但尚缺乏議題式的討論。¹¹第二，桐城研究多以桐城「派」為對象，較少注意桐城士人與桐城派之間的差異。筆者並非提議解構桐城派，而是主張面對此一已擴展成全國性的學派，應回過頭來，正視其學術理論、傳統與資源在桐城本地發展的情況。其中，十九世紀方東樹（1772-1851）的弟子方宗誠等人重新安排文學與程朱理學的相對位置，便是探究這兩股張力最明顯的例子。

方宗誠生長於桐城，於嘉慶廿三年（1818）至咸豐八年（1858），清朝轉衰且爆發戰爭期間，親身且深刻地觀察桐城學風的發展，並留下大量的材料。方宗誠家學以朱子學為宗，也受到流行於桐城的文章之學吸引，更有濃厚的撰述與編纂文獻的興趣。方宗誠的觀察、自身的轉變，以及他與學友間的學術活動，提供了一個考察桐城學術發展的獨特線索。¹²

對於清代學術中漢 / 宋、經學 / 理學等對立，學界已經多有修正，逐漸注意到清代思想與學術的複雜性。但「桐城派」內部文學與理學的關係，卻未有清晰的梳理。本文在上述的既有成果上，探究理學與文學間的張力，如何在桐城派學術傳承與被接受的過程中被凸顯，並進一步影響士人的選擇。十九世紀的桐城士人，他們喜好理學，但文人色彩濃厚，難以嚴格定義為理學家。本文將聚焦於這批士人，解讀他們的文集、編纂先賢文獻時的序跋，以及桐城學術

¹⁰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合刊）》（臺北：里仁書局，1995），頁 150；章太炎，〈清儒（一）〉，收入章太炎、劉師培等撰，羅志田導讀，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7；劉師培，〈清儒得失論〉，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頁 155、163。

¹¹ 雖然顧易生（1924-2013）、曾光光與張循注意到桐城派文人在文與道之間搖擺與離合，但未深入探究，也沒有動搖桐城派兼顧理學與文學的形象。類似觀點可見：姜書閣，《桐城文派述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36-37、86；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631-632、634、658-662；高黛英，〈20 世紀桐城派研究述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2 期，頁 114-120；張晨宜、曾光光，〈桐城派研究學術史回顧〉，《船山學刊》，2006 年第 1 期，頁 172-174；顧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論及其歷史地位〉，《江淮論壇》，1982 年第 2 期，頁 48-55；曾光光三文：〈變法維新思潮中的吳汝綸與桐城派〉，《江淮論壇》，2001 年第 3 期，頁 94-98；〈徘徊於「文」、「道」之間的桐城派〉，《江淮論壇》，2004 年第 1 期，頁 150-155；《桐城派與清代學術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1-8。

¹² 關於方宗誠的介紹，請見龔書鐸主編，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下冊，頁 249-262。

的相關記述中的蛛絲馬跡，藉此說明身處動盪時代的桐城士人，在繼承桐城先賢的學術遺產時，也調整了理學與文學的比重與相對位置，反映學術思想與政治社會環境的緊密互動。藉由這個案例，首先可以觀察全國性學術與地區性士人的互動，換句話說，即是地域士人如何面對已不再局限於區域的學術資源。接著，也可以觀察清代思想學術中，「漢 / 宋」以及「傳統 / 現代」以外的其他張力。要強調的是，文學與理學之間的張力，並不能簡化為單純的衝突與矛盾，而應視為兩種相輔相成的立場與思考，形成了「桐城派」士人的思考論域。這股張力，不但呈現傳統士人的思想性與創造力，另一方面，或許也是我們理解士人與知識分子如何思考文、道關係的重要線索。換言之，本文有助於在既有框架外，認識十九世紀清代思想學術的樣貌，以及傳統內部的多元與活力。

二、理學與文學的潛在張力

十九世紀桐城士人並非製造出理學與文學的衝突，而是凸顯了理學傳統，以及桐城派先賢早已存在的張力。¹³桐城派發展時間長、影響範圍擴及多個地域，又含括大量人物，更由於發言的不同脈絡與場合，存在著許多分歧的言論與思想。正如《桐城派編年》所言，桐城派具有「隨時而變」的特質，因此能夠維持長時段的生命力。¹⁴然而，在變動之中也有不變之處。本文關注的理學與文學的張力，便是其中之一。以內容豐富的《桐城派編年》為例，該書同時收錄包括批判、支持程朱者，傾向理學或文學的人物與言論。就同一人物而言，我們也見到方苞既嚴厲批判反程朱者，但也有包容各家學術的說法。這些看似矛盾的言論，正是我們一探桐城派內在思想張力的線索。

桐城派雖然強調並重理學與文學，但對他們而言，理學主要是立身處世的準則。他們畢竟是將精力投注於古文寫作，致力提升文藝之學的地位，造成文

¹³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冊4，頁21-85；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頁54-71；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132、178-183、228-234。

¹⁴ 俞樟華、胡吉省，〈前言〉，《桐城派編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上冊，頁30-31。

學與「窮經」之間的緊張。¹⁵因此，我們在代表性人物討論文章書寫的內容與形式時，可以發現許多在理學與文學間游移的言論。筆者在此簡略舉出若干例子，說明這股張力實為十九世紀桐城士人在重塑學術傳統時，凸顯與發揮的基礎。

我們先從所謂的「桐城三祖」說起。首先，方苞討論「散文」寫作時，他認為理學五子講學的口語即如同佛教的言論，不應寫入散文中。在他看來，引用語錄會使得文章不「雅馴」。在此，方苞站在文學的角度，認為語錄的內容與形式均有害於寫作的表達以及藝術性。¹⁶這明顯與理學家的立場不同，甚至也不符合康熙皇帝對於理學與文學的態度。¹⁷無怪乎，晚清北京理學圈的代表人物唐鑑（1777-1861），便指出相對於純正的理學家陸隴其（1630-1692）與張履祥（1611-1674），方苞畢竟是文章表現大於德行。¹⁸唐鑑的說法，指出方苞學行中仍有偏重。接著，乾嘉時期為宋學發聲的姚鼐也有類似的言論。姚鼐提出義理、文章與考證「異趨而同為不可廢」的說法。¹⁹然而，學者指出姚鼐的立論核心其實是主張文章有相對於考據與義理的獨立性。²⁰姚鼐特別提高聲名相對不顯的劉大櫟（1698-1779），使其與方苞並列，同時渲染自己與劉大櫟的聯繫，這是為了建立由方苞開端，劉大櫟承其流，而姚鼐緊接在後的桐城文系與古文文統。在考據學如日中天的學術環境中，姚鼐正是想要賦予文章

¹⁵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2（2006 年 6 月），頁 53-111；〈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學海》，2015 年第 2 期，頁 186-204；張循，〈清代中期的「文士」與「文章」——讀章太炎《噓書·清儒》篇書後〉，《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57（2017 年 6 月），頁 156-165。

¹⁶ 《方苞集》，上冊，卷 6，〈答程夔州書〉，頁 166。

¹⁷ 如康熙十二年（1673）上諭：「文章以發揮義理，關係世道為貴。騷人詞客，不過技藝之末，非朕所貴也。」〔清〕鄂爾泰等纂，《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1，卷 43，「康熙十二年八月廿四日」，頁 572。

¹⁸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94），冊 1，「道光廿三年（1843）二月初四」，頁 156。

¹⁹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嘉慶三年刻本），冊 377，卷 6，〈復秦小峴書〉，頁 21b-22a，總頁 371。

²⁰ 顧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論及其歷史地位〉，《江淮論壇》，1982 年第 2 期，頁 51。

獨立的價值，並建構一條文統，以文學對抗戴震（1723-1777）代表的漢學。²¹從此可見，姚鼐確實有提高文章地位的意識。然而，我們不能忽略姚鼐也有批判文士的言論。他認為，文章之美惡應當以是否「當乎理，切乎事」為標準。²²換句話說，姚鼐在此則將文章的技藝與藝術性放在次要位置。最後，劉大櫚更是直接批判程朱理學，提倡文學的價值。編纂《國朝文錄》的李祖陶（1776-1858），以及晚清桐城代表人物吳汝綸（1840-1903），分別指出劉大櫚寫作得力於史學，展現「奇」而「詭」的特色，文風接近《戰國策》。²³誠然，劉大櫚認為寫作時，若以「理」為主導，便不能發揮文章之精妙。他也在「義理」、「書卷」與「經濟」外，強調「行文」的獨立性。劉大櫚提高文人的地位，認為義理、考據與經世只是作文時的材料，作文時的神韻氣勢以及音節，才是文人應該發揮的強項。換言之，劉大櫚著重的是文章的書寫技巧，至於文章中的內容或是材料，都不應該影響文章的書寫形式與藝術性。因此，學者稱劉大櫚具有「詞章」的專業意識。²⁴

桐城三祖有若干提倡文學、甚至理學會妨礙文章表現形式的言論。到了他們的弟子輩，理學與文學的張力則更為明顯。筆者將以姚鼐著名弟子為主，點出這個現象。嘉道時期，受到經世學風以及程朱理學復甦的氛圍感染，相對於姚鼐顯露出的文章獨立意識，姚瑩（1785-1853）強調姚鼐篤信程朱義理，姚鼐的文章是載「道」，而非只是詩文創作。姚瑩明白表示：「文者載道以行，捨道以為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傳」，他貶斥沒有承載道的文章只是技藝。²⁵

²¹ 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103-121。

²²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77，卷 1，〈稼門集序〉，頁 25b-26b，總頁 458。

²³ 〔清〕李祖陶，《國朝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清道光十九年經訓堂刻本），冊 1670，〈海峰文鈔文錄引〉，無頁碼，總頁 415。〔清〕吳汝綸撰，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2），冊 1，〈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頁 359-360。

²⁴ 張循，〈清代中期的「文士」與「文章」——讀章太炎《噓書·清儒》篇書後〉，《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57，頁 158；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頁 72-80。

²⁵ 〔清〕姚瑩，《東溟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同治六年姚濬昌安福縣署刻中復堂全集本），冊 549，卷 3，〈與張阮林論家學書〉，頁 3a-3b，總頁 339。

換言之，姚瑩推崇的是姚鼐文章的內容——道，而貶低空有藝術性的寫作形式。另外，管同（1780-1831）與方東樹也有「文士卑不足爲」，以及「文章一小道，於學非本務」這般貶斥文士與文章的言論。²⁶方東樹晚年更提醒學生程朱義理才是本，文章寫作僅爲末，千萬不可以文章自矜自喜，徒有詩稿、文集是沒有意義的。²⁷

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反的言論。方東樹便曾表示過，理學可能會限制文學的創作，他指出方苞是因爲受到程朱理學影響，導致「文氣轉拘束，不能闕放也」。²⁸梅曾亮（1786-1856）則認爲，作詩應該放空心，不可有先入爲主的累贅。雖然他並未明指程朱義理，但可見他強調寫作時抒情的意義。²⁹換言之，梅曾亮意識到作者的學問內容，可能有礙書寫表現時的美感。梅曾亮自謙未嘗涉獵「性理」，他也反對「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他並不認同必須先有德行爲基礎才能寫作。³⁰最後，與桐城派關係疏遠的文人，則表現出更明顯不滿意程朱理學的言論。如吳嘉淦（1790-1865）精研古文義法，並以「儀宋」爲堂名。但他強調「志在學宋人之文，非程朱之學也」。³¹綜合而言，這些言論不但反映文人「重文」的一面，更顯示桐城理學與文學的關係，不能不證自明地畫上等號，而是經過討論與協調的。

²⁶ [清]管同，《因寄軒文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冊 532，卷 4，〈方植之文集序〉，頁 6a-7b，總頁 349-350；[清]方東樹，《考槃集》，收入嚴雲綬點校，《方東樹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卷 1，〈夢異之〉，頁 540。

²⁷ [清]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收入《方東樹集》，卷 8，〈辨志一首贈甘生〉，頁 390-391。

²⁸ [清]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收入《方東樹集》，卷 5，〈書望谿先生集後〉，頁 312-313。

²⁹ 梅曾亮先是提到朱彝尊爲詩「自得者少，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而後則正面指出「然方其爲詩也，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悉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助吾詩於言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在下段引文，梅曾亮又更直接地表示不一定要以性理、德行爲文章基礎。筆者認爲，這就是梅曾亮表達作詩要擺脫學問等束縛，言辭直接率真。[清]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咸豐六年楊以增楊紹穀等刻民國七年蔣國榜補修本），冊 552，卷 7，〈劉楚楨詩序〉，頁 8b，總頁 540。

³⁰ [清]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 1，〈答吳子敘書〉，頁 20a，總頁 492。

³¹ [清]劉聲木撰，徐天祥點校，《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1989），卷 1，頁 85-86。按，前面舉方東樹、梅曾亮等著名弟子，是以桐城士人爲例證，最後加入吳嘉淦的例子，則是說明這種言論的普遍性。

總而言之，桐城派人物討論文章的內容與文章的寫作技巧，以及兩者的關係時，在特定的語境與脈絡中，皆有不同的說法。這些言論若脫離了本來的脈絡，便成爲後繼者重建與安排學術傳統時，各取所需的資源。以下，將進入十九世紀桐城士人繼承、選擇以及凸顯前輩學術遺產的狀況。

三、十九世紀上半文學與理學的消長

十九世紀上半，當經世思潮與理學復興的風氣興起時，士人開始反省漢學「無用」，並提倡經世與重新鼓吹理學。這除了爲桐城一地帶來我們熟悉的漢宋之爭外，也促使理學與文學的張力浮上檯面。清代中晚期，在經世需求孔急以及理學逐步復興的特殊環境下，³²桐城一方面繼承了桐城派豐富的學術資源，但也必須面對這股張力。以下，筆者將透過方宗誠的記述，說明桐城一地理學與文學此消彼長的學風發展。接著，指出方宗誠在強烈的理學關懷下，如何調整桐城學術中理學與文學的相對位置。

（一）文學對理學的壓迫

「天下文章出桐城」，本是對桐城一地學術成就的稱讚，但是在方宗誠的眼中，桐城強盛的文學風氣不但產生流弊，甚至壓抑了程朱理學。方宗誠認爲，清代的桐城正是一段理學與文學消長的發展史，方氏一族則是獨力維持著程朱理學於不墜的關鍵。

在方宗誠的筆下，早在桐城派聞名全國以前，康熙時期的方日新（生卒年不詳）開啓了家族「世守朱子學不變」的濫觴，並傳承至乾嘉時期力抗漢學的姚鼐。方宗誠指出，方日新與學友胡國鈞（1649-1717）及孫學顏（1677-1734）

³² 關於清代中晚期理學復興的討論，請見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田富美，《清代中晚期理學研究：思想轉化、群體建構與實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Chiu Wei-Chun, "Morality as Politics: The Restoration of Ch'eng-Chu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

於桐城共講朱子學。方宗誠的伯曾祖待廬先生方澤（1697-1767）不但師從方日新，更與上述諸人相為師友，共講理學。隨後，方澤影響了弟子姚鼐：

弟子姚惜抱郎中為得其傳。當乾嘉間〔間〕，海內漢學昌熾，詆毀程朱，而惜抱獨持正論，以障狂瀾，以待廬先生之言先入為之主也。³³

方日新的影響不僅涉及方氏家族以及桐城一地，甚至透過姚鼐而擴及整體學風。換句話說，方宗誠抬高家族的重要性，認為方氏一族正是康熙朝至乾嘉間，維繫朱子理學的重要線索。然而，桐城一地的理學在方日新等人身後卻逐漸黯淡。方日新、胡國鈞與孫學顏不顯於當世，著作不見於世，方志更不載其名，從此「學術晦而士習靡，心性昧而浮文熾」。方宗誠將「心性」與「浮文」作為對比，並且感嘆桐城雖以「文學」聞名於世，但獨守儒者真言的三先生卻消逝在世人的記憶中。³⁴從此，桐城的這條理學伏流，便只存在於方宗誠的家族，成為他們引以為傲的家學特徵。³⁵

方宗誠強調桐城在文學上的成就掩蓋了理學的發展。他也藉由記述方澤承先啓後的角色，凸顯方氏家族在桐城傳承理學的貢獻。然而，比較姚鼐的紀錄卻非如此。在方宗誠以前，關於方澤的紀載以姚鼐〈方侍廬先生墓誌銘有序〉以及《桐城續修縣志·文苑傳》最為完整。相較於方宗誠強調姚鼐受到理學的啓發，姚鼐雖然提到方澤「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且稱讚方澤弟子於科舉中的傑出表現，但卻隻字未及自己受到方澤的影響，更遑論朱子理學的部分。³⁶《桐城續修縣志》則描繪方澤以「文學」聞名，與經學家、文學家友善，

³³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光緒六年至十二年刻本），冊 672，卷 7，〈三隱君子傳〉，頁 9a-9b，總頁 179。

³⁴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 7，〈三隱君子傳〉，頁 9b-10a、15a，總頁 179、182。按，此為方宗誠的論述，孫學顏因呂留良曾靜案牽連被殺，但仍有著作流傳。

³⁵ 方宗誠在家傳中也特別強調理學線索，他記錄三先生講究朱子學，創精舍祭祀朱子，以及姚鼐師事方澤的往事。〔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光緒六年至十二年刻本），冊 672，卷 13，〈先世事實紀〉，頁 2b-3a，總頁 121-122。

³⁶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卷 13，〈方侍廬先生墓誌銘有序〉，頁 21b-22b，總頁 422-423。

互相切磋文學的形象，並未特別標示理學特徵。³⁷從此可見，方宗誠特別凸出了方澤在理學方面的成就，並且誇飾了方澤與姚鼐之間的理學傳承關係。他試圖藉此提醒讀者，桐城除了顯赫的文學以外，潛藏在方氏家族的理學也是不容忽視的學術線索。

康熙時期方日新等人於鄉里倡導理學，但乾嘉時期這一條理學線索卻為桐城文學的燦爛表現所掩沒。方宗誠指出，乾嘉之間「天下承平」，桐城後進者皆將才能與心力投入於「文學」，於詩、文等方面各有所長。海內外都稱羨桐城文學之士的蓬勃。³⁸觀方宗誠之意，他出生以前的桐城因為方、劉、姚之遺緒而學風鼎盛、人文薈萃。然而，諸賢的成就集中在廣義的文學上，康熙年間盛行的理學可謂已經不復存在。

方宗誠出生後更是每況愈下，桐城一地的理學幾乎不見蹤影。嘉道時，桐城正處於時代轉折之交。乾嘉時期「人文薈萃」的「雍容文物之氣象」已逝，學風早已大不如前。方宗誠語帶遺憾地表示，承續桐城派遺風的前賢或是相繼老死，或是衰老且散居各處。雖有晚年歸鄉的數位前輩，但他們的學術興趣各有偏重，成就也各自不同。³⁹值得注意的是，桐城無論在極盛與轉衰的時候，程朱理學都不是一個特別凸出的面向。方宗誠在這篇為桐城古文前輩撰寫的敘文中，已經隱然流露出對時代與學術逐漸黯淡的惆悵。其他地方，方宗誠則直接批評桐城文學風氣的流弊。他指出，桐城一地因為「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說法，吸引了眾多假託於桐城文學的依附者。方宗誠批評他們「無其內而飾其外，逐其名而喪其實」，不僅敗壞學術人心，更是造成桐城慘遭戰亂的原因之一。⁴⁰方宗誠的說法雖是傳統士大夫學術影響人心，人心又影響社會的邏輯，

³⁷ [清] 廖大聞修，[清] 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冊 1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刻本），卷 16，〈文苑傳〉，頁 44b-45a，總頁 561。

³⁸ [清] 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 2，〈存悔軒文集敘〉，頁 7b，總頁 66。

³⁹ [清] 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 2，〈存悔軒文集敘〉，頁 7b-9a，總頁 66-67。

⁴⁰ [清] 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 5，〈贈宗屏敘〉，頁 5a，總頁 157。

但也反映了乾嘉至嘉道間，社會由雍容而衰敗的客觀發展，促使方宗誠以負面的角度看待學風的轉變。

方宗誠對文學末流心存不滿，當他將話題集中在理學，表揚有特殊理學成就的人物時，便將文學與程朱理學的張力，提升到衝突的程度。他將桐城崇尚文雅與投入義理的士人分為兩組，說道：

桐城自望溪方氏、海峯劉氏、惜抱姚氏三先生起，以經學、古文革後進，末流之弊大都尚文雅，而鮮研究義理之書。獨玉峯先生〔許鼎（1781-1842）〕及先生〔蘇惇元〕初為於舉國不為之時，窮理篤行，卓然不遷於流俗。逮植之先生歸里，及門講習者益多，而後學者始知當從事於根本之地。⁴¹

方宗誠認為「桐城三祖」經學與古文並重，但後學流於「文雅」荒廢「義理」，便造成流弊。他接著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除了我們熟知的方東樹外，桐城一地還有許鼎與蘇惇元，在理學尚未風行之前便投入理學。隨後，再加上方東樹歸里，桐城學風才開始轉變。方宗誠在此將文雅與義理作為一組優劣對比。在他處，他以更為強烈的語氣，將詩文置於朱子學的對立面，他說：

吾鄉自望溪、惜抱以文學為海內宗，故近世語古文者，必曰桐城。而力守朱子之學以淑身導世，期與古大儒比並，則自吾師玉峯許先生、從兄植之先生兩人始。厚子先生〔蘇惇元〕亦崛起而應之，其後吾鄉知進求儒者之學，而不專溺於詩文者，遂十餘人。⁴²

方宗誠這段文字，先是將古文與朱子學分立，接著強調投入朱子學的士人優於其他沉溺於詩文者。對於方宗誠而言，由於上述諸人的投入，桐城學風開始出現轉向程朱理學的契機。

⁴¹ 〔清〕方宗誠，《柏堂集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光緒六年至十二年刻本），冊 672，卷 3，〈《遜敏錄》敘〉，頁 20a-20b，總頁 237；〔清〕方宗誠，〈《遜敏錄》敘〉，收入〔清〕蘇惇元，《遜敏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影印清同治六年儀宋堂刻本），輯 5，冊 9，頁 1b，總頁 22。

⁴² 〔清〕方宗誠，《柏堂集續編》，卷 20，〈蘇懋甫哀詞〉，頁 1a-b，總頁 380。

方宗誠一再提及的方東樹、許鼎與蘇惇元，都是桐城少數理學色彩濃厚的士人。其中，許鼎的親身經歷反映了桐城理學與文學之間的偏重轉移。當方東樹客游於外，「鄉里後輩無從聞其教」時，⁴³許鼎早已經在桐城以程朱理學闡然自修。⁴⁴許鼎與桐城派並無淵源。許鼎自幼展現詩、文與書法的天分，他的父親擔心許鼎成爲名士，因此授以明代程朱理學大儒薛瑄（1389-1464）的《讀書錄》。此後，許鼎以求道爲志向，淡化詩文書法的興趣。⁴⁵許鼎成學後與桐城當時的學風相當隔閡。許鼎與方宗誠都指出，當時桐城「正學久衰」，少有人與許鼎來往問學。⁴⁶方宗誠更直接地批評，正是文詞之學的盛行，才使得許鼎遭受漠視。方宗誠說：

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文詞盛而實學衰，多不知古人爲己之學，見先生所爲多駭之。……道光間，吾桐潛心宋賢之學者，先生一人而已。⁴⁷

方宗誠雖不無誇飾地凸出許鼎的學術地位，但這也反映道光時期桐城文學盛於理學的現象。來自浙江的宗稷辰（1788-1867）同意方宗誠的說法。宗稷辰與桐城士人頗有來往，他也以文學、理學對立的架構，以及桐城以文學爲主流的預設，指出：

桐之學術向以文勝，士類之氣習多以名勝。若許子者，著述至約，稱譽鮮聞，一二及門信從之，已足以變易風俗。⁴⁸

宗稷辰稱許鼎及弟子能夠移風易俗，純屬溢美之辭。但他所謂一二及門者，便是指方宗誠而言，方宗誠父子是少數與許鼎往來的桐城士人。方宗誠的父親主動親近許鼎，並令方宗誠向許鼎學習。⁴⁹然而，除了方宗誠外，許鼎並沒有吸

⁴³ [清]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十五年京華印書局鉛本），冊540，卷1，頁4b，總頁553。

⁴⁴ [清]許鼎，《許玉峯先生集》（清同治五年重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3，〈答方生宗誠〉，頁7b；[清]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1，頁4b，總頁553。

⁴⁵ [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7，〈玉峯先生行狀〉，頁1a，總頁93。

⁴⁶ [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7，〈玉峯先生行狀〉，頁4b-5a，總頁95。

⁴⁷ [清]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1，頁1a-b，總頁552。

⁴⁸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咸豐元年刻本），冊576，後編卷2，〈書許玉峯集後〉，頁3a，總頁692。

⁴⁹ [清]許鼎，《許玉峯先生集》，卷3，〈答方生宗誠〉，頁7b。

引到其他的學生。從此可見，在桐城強勢的文學風氣下，方宗誠父子與許鼎只是桐城少數願意投身奉行理學的士人。理學在桐城相對消沉，無怪乎許鼎擔心歸鄉後，方宗誠會缺乏討論理學的學友。⁵⁰

雖然方東樹的門人也生活於桐城，但他們不專門投入理學。⁵¹方東樹的弟子中，蘇惇元是少見具有濃厚理學色彩的士人。蘇惇元的理學興趣與桐城派沒有直接關係。蘇惇元的古文受到方苞影響，但他的家學是以朱子為宗，傳至蘇惇元時更篤好朱子理學，隨後才拜方東樹為師。⁵²蘇惇元曾赴浙江廣泛蒐集張履祥文獻，編輯張履祥年譜，並有志運作張履祥從祀孔廟。⁵³蘇惇元如同許鼎，在方東樹返鄉前便在桐城獨力持守理學。蘇惇元藏書豐富，他向方宗誠介紹張履祥、陸隴其與方苞之學，說明「為學塗轍甚備」。值得注意的是，蘇惇元是在文以載道的標準下，推崇方苞。⁵⁴下一節，筆者將進一步說明這點。總之，方宗誠父子、許鼎父子以及蘇惇元等人，是桐城少數投入理學的士人，但他們對理學的興趣，都與桐城派沒有太大的關係。桐城一地在桐城三祖的影響下，向來以詩詞古文為長，在文風最為鼎盛的乾嘉時期，理學更是被忽略。桐城學風為桐城帶來的是興盛的文章之學。何況到了方宗誠生長的道光時期，整體學風逐漸黯淡，理學更僅有少數幾人闡然持守。換句話說，方宗誠雖然稱讚乾嘉時期「天下承平」時文學之風盛行，但乾嘉也正是他所謂「正學久衰」，理學遭受忽視的時代。文學與理學的張力躍然紙上。

道咸之交，伴隨著清代學風的轉變，朝野士人開始提倡理學，過去受到漢學打壓的理學又重新浮上歷史的舞台。桐城以往文學壓抑程朱理學的情況出現了反轉。方東樹自道光二十年（1840）夏天歸里，直到咸豐元年（1851）遠赴

⁵⁰ [清]許鼎，《許玉峯先生集》，卷3，〈與植之先生〉，頁13a。

⁵¹ [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3，〈書江貽之空山夜坐圖後〉，頁10b-11a，總頁74-75。

⁵² 方宗誠稱蘇惇元三十歲時投入理學，而後才師事方東樹。[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7，〈蘇厚子先生傳〉，頁4b-5a，總頁176-177。

⁵³ [清]馬其昶著，毛伯丹點注，《桐城耆舊傳》（合肥：黃山書社，1990），卷11，〈蘇、許、朱、方四先生傳〉，頁419。

⁵⁴ [清]方宗誠，《柏堂集續編》，卷3，〈《遜敏錄》敘〉，頁19b-20a，總頁237。

祁門東山書院的十年間，相當程度地激發桐城的理學風氣。⁵⁵然而，更大的原因還是十九世紀中葉，清代整體社會條件的轉變。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前述方日新、胡國鈺與孫學顏的著作重現於世。

太平天國戰爭波及桐城，是學風扭轉的直接因素。方宗誠指出，桐城素來文風鼎盛，藏書豐富，然而：

自城陷後，煨燼散亡，殘缺殆盡。雖向之巨帙重編有大名於時者，今或不見其隻字矣。而二先生微言至論，向之人所棄置不復理者，今反以亂而顯。二先生之文顯，而其一時往來講學諸君子潛德隱行，師友淵源，亦因之以顯。是雖天道顯晦之運，非人力所能為，而子思子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不益於斯足信乎？⁵⁶

雖然方宗誠在文字筆法上，將理學重見天日之因歸功於天道，但正是受到戰亂的刺激，才造成「文學」與「義理」之著作更迭的情況。也就是說，桐城士人對義理學問以及修身持守產生更大的需求。這導致士人在「書賈殘帙」中注意到胡國鈺與孫學顏之著述，他們往來講學之事蹟也重新浮現在世人的眼中。總之，隨著政治社會現實的改變，方宗誠身邊的士人開始講究理學。其中不乏生長於風雲即將變色之際，與方宗誠年歲相近的一輩。⁵⁷從此可見，相較於「正學久衰」的乾嘉時期，道咸間桐城的理學火苗逐漸復甦。儘管方東樹晚年歸里具有學術轉折的標誌性意義，但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下半，擔起發揚並凸顯桐城程朱理學重擔的，則是方宗誠。

⁵⁵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1，〈《桐城文錄》敘〉，頁21a，總頁143。

⁵⁶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7，〈三隱君子傳〉，頁10a，總頁179。

⁵⁷ 如方淇(?-1846)、趙獻(?-1856)、唐治(生卒年不詳)、方潛(1809-1868)、張泰來(生卒年不詳)與馬三俊(1820-1854)等人。[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12，〈方子春哀詞〉，頁4a-b，總頁117；[清]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1，頁4a、7b，總頁553、555；[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2，〈書唐魯泉明府墨蹟後〉，頁5b，總頁146；[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9，〈記馬命之遺言〉，頁2b，總頁186；[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3，〈書亡友張瑞階筆記後〉，頁7b，總頁73。

（二）桐城理學地位的提高

要如何在桐城強盛的文學風氣以及豐富的文學遺產中，安排理學的位置？這是方宗誠在提高理學時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方宗誠從咸豐元年前後，直到咸豐九年（1859）離開桐城間，投入相當心力調整桐城程朱理學與文學的關係。

方宗誠自述為學經歷時，就開始著手調整理學與文學的輕重。儘管有家學以及許鼎與蘇惇元的理學啟發，但方宗誠也受到桐城文學風氣影響，早年致力於古文創作。光緒六年（1880），方宗誠回顧自身為學歷程時，他承認當時興趣是文學與理學並重。他將咸豐三年（1853）以前的學術興趣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周、程、朱子之書」，一是「賈、董、韓、歐、曾氏、明歸氏之文」；近代則分別喜好薛瑄、張履祥與陸隴其之義理，以及方苞與姚鼐的文章。⁵⁸方宗誠在此沒有對理學與文學進行價值判斷，但很清楚地將它們分為兩個相對獨立的範疇。在其他文章，方宗誠則為早年投入文學的經歷提出辯解。方宗誠指出，桐城士人在耳濡目染之下，往往喜歡以「文辭」自我誇耀，他自己也不例外。然而，儘管方宗誠承認受到桐城的文學吸引，但他也強調文學並非士人的首務，他強調自己是以「餘力」從事於詞章。⁵⁹對於自己的文學名氣，方宗誠也提出解釋，一再強調自己著重的是文章的內容，並非特別著意於寫作技巧。如在家訓中，方宗誠說明自己並沒有專攻寫作技巧，只是藉文章發明義理，他並告誡子孫不得寫作炫人耳目，沒有實用的空文。⁶⁰他向學生解釋，雖然外人多稱讚自己的文章，但他並不是單純喜歡作文，而是專注於「窮理之學」，藉由文字發明義理。⁶¹另外，他向學生說明文章只是末節，只要致力於窮理功夫，

⁵⁸ 〔清〕方宗誠，《柏堂集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光緒六年至十二年刻本），冊 672，卷末跋，〈柏堂集前編跋〉，頁 1a，總頁 564。

⁵⁹ 〔清〕方宗誠，《柏堂集補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光緒六年至十二年刻本），冊 672，卷 2，〈《徐椒岑文集》序〉，頁 8a，總頁 651。

⁶⁰ 〔清〕陳澹然，《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影印國家圖書館普通線裝書館藏別傳古籍），冊 52，〈學問略第二〉，頁 40b-41a，總頁 633-634。

⁶¹ 〔清〕方宗誠，《柏堂集補存》，卷 1，〈與徐晉生書〉，頁 10b，總頁 646。

文辭自然通順。反之，若沉溺文辭，則會淪為「名士」或「文人」。⁶²值得注意的是，咸豐五年（1855）方宗誠為自己的文集作序時，謙稱自己「文事未工」，也清楚文章僅為末節，但由於師友認為他對義理有所發明，因此才在師友鼓勵下勉強編輯文集。⁶³在此，方宗誠貶低自己的文章表現，提高義理的比重，引師友的勉勵語來強調自己的文集絕非文人之作，而是有發明義理的貢獻。直到方宗誠離開桐城後，當曾國藩（1811-1872）建議方宗誠作文要講究訓詁與詞章時，方宗誠仍強調自身「體氣薄弱」，僅能以義理為主，無力兼顧其他二者。⁶⁴方宗誠這類看似自謙的說詞，正表露出他認為文章的義理內容，要比文章寫作的表現形式更為優先且重要的想法。從此可見，儘管方宗誠友人稱讚方宗誠成功達到文道合一的目標，⁶⁵但不論是方宗誠自己或是其他學友，其實都注意到作為文章內容的理學，與作為書寫形式的文學之間存在的張力，士人在兩者之間必會有所偏重，也必須有所取捨（後文將指出，方宗誠的桐城晚輩，批評他的理學信仰影響了文章寫作）。在此，《清史稿》說方宗誠「能古文」，熟悉儒家性理，「欲合文與道為一」的「欲」字，正是指出方宗誠在文、道之間的掙扎與拉扯。⁶⁶

方宗誠儘管不否認從事文章的經歷與成績，但也撇清自己的「文人」標籤。當他重建桐城學術傳統時，也作了相似的安排。方宗誠既要表揚桐城的文學成就，又得提醒讀者理學才是根本，這種態度在他撰寫桐城相關文集序言時特別明顯。方宗誠為文選作序時，他引用劉摯（1030-1098）與楊簡（1141-1226）之言，強調「文人之文」僅為巧言，「文人」不足觀，他提醒讀者不當從事於華而不實的文章。⁶⁷另外，當他提及士人以著述為志時，也強調「立言」要以

⁶² [清]方宗誠，《柏堂集外編》，卷4，〈與黃生鐵生〉，頁10a-10b，總頁703。

⁶³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1，〈柏堂文集自敘〉，頁2b-3b，總頁134。

⁶⁴ [清]方宗誠，《柏堂集外編》，卷7，〈復曾節相〉，頁20b-21a，總頁747-748。

⁶⁵ [清]黃彭年，〈柏堂集餘編敘〉，見[清]方宗誠，《柏堂集餘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光緒六年至十二年刻本）冊672，頁1a-1b，總頁566。

⁶⁶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冊44，卷486，〈列傳二百七十三·方宗誠〉，頁13430。

⁶⁷ [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2，〈徐、庾文選敘〉，頁4a-5a，總頁64-65。

德、功爲本，若能從事於修身、性理與經世，文章自然不朽。⁶⁸同樣地，方宗誠爲友人的詩集作序，也強調友人是在切磨身心、探討經世之餘，才以餘力從事詞章。⁶⁹

方宗誠評價清代桐城整體的文學成就時，更是以文章承載的義理爲判準，而不著重文學藝術的一面。方宗誠主導編纂《桐城文錄》蒐集先賢文章，他在收錄原則提到「大約以有關於義理、經濟、事實、考證者爲主，則皆必歸於雅馴。其空文無事理，或雖有事理而文鄙倍者，不錄。」這看似並重文學與理學，但實際收錄時，則特別以內容涉及理學義理者爲重，並因此收入文章寫作不夠完美的士人。方宗誠簡述收錄各家的優點時，也一再強調「文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因此作文應當「盡言之理」、「足乎人之心」。方宗誠收錄前述理學三先生之一的孫學顏，強調孫學顏因爲窮理有得，因此他的文章「理正氣純」、「韻長辭雅」。另外，方宗誠也收錄「不以文名」，但論理頗有可觀的士人，以及「文事雖未精」，但於義理、經濟有創獲的姚瑩，還有「文雖未精」，但於義理有實得的戴鈞衡。更重要的是，方宗誠在《桐城文錄》序文中，給予方東樹最高的地位。他強調方東樹的境界與成就自成一格，遠超出姚鼐。正是因爲方東樹「務爲窮理盡性之學，真知文之精意，而未嘗專用力」。方宗誠接著指出，在方東樹之後，學者多爲窮理之學。因此，他收錄了許鼎、蘇惇元等許多「宗主理學者」。⁷⁰從此可見，方宗誠降低了桐城文學傳統中技巧與藝術性的一面，轉而強調理學的重要性。他改變桐城的學術形象，試圖扭轉乾嘉以來，文學壓過義理之學的情況。

方宗誠除了以自身的經歷，以及重新詮釋桐城文學之發展重點，告誡世人不可以沉溺於雕磨作文技巧與藝術性外，他也編纂以文學爲主題的選本與課本，教導後學程朱義理方爲文章的根本。咸豐四、五年間（1854、1855），方宗誠指示兒子與學生作文訣竅，編成《文章本原》三卷。《文章本原》標題顯

⁶⁸ [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卷2，〈味經山館文集敘〉，頁6a-7a，總頁65-66。

⁶⁹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1，〈斗垣詩集敘〉，頁1a-2b，總頁133-134。

⁷⁰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1，〈桐城文錄敘〉，頁15a-21b，總頁140-143。

示方宗誠以說明文章之本原為宗旨。方宗誠強調文、道理論上應該合一，文章之學不能獨立存在，因此不可以於道之外追求文章技巧。方宗誠認為，這是歷代詩文家都未能明白的道理。⁷¹接著，方宗誠在友人的建議下，編輯古文寫作範本《古文簡要》。但在這本簡選韓愈、歐陽修文章的範本中，方宗誠不滿足於教導古文之「法」，他強調文章之根本是「道」。即使是寫作抒情文，也要先理明、道充於心，進而抒情於外，不能僅是模仿古人字句與音節。方宗誠一再強調，《古文簡要》所示只是「法」而非本，必須「不溺其心於文焉，而文將不可勝用矣」。⁷²總之，《文章本原》與《古文簡要》都提醒學者義理為文章之根本，理學為寫作之主導。

咸豐六年（1856），方宗誠編輯《斯文正脈》，表現更大的企圖。方宗誠捨棄一般人眼中的文章之學，直接以理學家的著作為文章「正脈」。方宗誠首先指出「文」只是「道」的彰顯。孔子所謂「斯文在茲」，即是指道而言，「博學於文」也是追求闡明此道。他強調，若是離卻了道，文與博學都沒有獨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方宗誠以秦漢以後的「文章之士」為例，說明專以文字為文章者，導致世道「文日浮而道日晦，文日多而道日裂」。直到宋明理學家才恢復孔子道在文中的傳統。因此，方宗誠收錄宋以下的「載道之文」，標明文章正脈所在。⁷³包括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朱熹（1130-1200）、張栻（1133-1180）、陳淳（1159-1223）、蔡沈（1167-1230）、真德秀（1178-1235）、張履祥與陸隴其這類著名理學家；選文則皆為著名的理學文獻，如〈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仁說〉與〈大學衍義序〉等。⁷⁴從此可見，方宗誠不但提醒桐城士人，理學義理是文學之「本原」，他更直接以理學家之理學文獻，作為文章之學的「正脈」。

71 〔清〕方宗誠，《柏堂集後編》，卷5，〈文章本原跋〉，頁10b-11b，總頁444。

72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1，〈古文簡要敘〉，頁8a-11a，總頁137-138。

73 〔清〕方宗誠，《柏堂集次編》，卷1，〈斯文正脈敘〉，頁6a-8a，總頁136-137。

74 〔清〕方宗誠，《柏堂集外編》，卷2，〈示馬生兄弟〉，頁17b，總頁684。

總而言之，在方宗誠的敘述中，桐城受到桐城派文學的影響，文學風行，甚至壓縮程朱理學的空間。方宗誠指出文學與理學此消彼長的關係，並試圖凸顯桐城的理學面向。換言之，他提高理學的地位，藉由重建學術傳統來改變桐城的學風。接著，方宗誠及學友在描繪具有全國性聲望的桐城人物時，也採取了類似的策略。

四、桐城派學術的凸顯與繼承

方宗誠身邊聚集了一些理學色彩濃厚的桐城學友，他們在描述與評價桐城派代表人物時，也採取壓抑文學，提高理學的策略。這不單單只是形象塑造的問題，應該理解為，他們透過凸顯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某些特質，選擇繼承了學術傳統中的特定成分。這方面的材料，以他們對方苞的記述最為集中，而方苞正是桐城學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此本節將以方苞為討論核心。

蘇惇元視方苞為「吾鄉」先賢，他和戴鈞衡對方苞的讚許，展現了與方苞弟子不同的評價方向。⁷⁵在標示方苞學術特色的文集序言，以及敘述方苞一生學行的傳記資料中，特別可以看到相對於方苞弟子而言，桐城後輩特別著重於方苞的程朱理學面向。他們凸出程朱理學的同時，也使得文章與理學的張力浮上檯面。筆者將先說明方苞弟子們的記述，作為比較的基準，接著討論桐城後輩於咸豐元年前後的編纂特色，並指出他們對理學的強調甚至比方東樹更為強烈。

⁷⁵ 儘管先有姚鼐打出「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後有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正式打出「桐城派」的旗號，強調桐城派的全國性地位。但蘇惇元稱方苞為「吾鄉方望溪先生」，戴鈞衡並以方苞未能從祀鄉賢為憾。〔清〕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收入《曾國藩全集·詩文》，頁 245-247。另見戴鈞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清〕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序〉，收入《方苞集》，下冊，頁 914、916。

（一）執禮弟子筆下的方苞

早在方苞生前及甫逝之時，其弟子便已著手編纂文集與相關傳記資料。十九世紀的桐城士人則以前者的工作為基礎，進一步蒐集相關資料並編纂文集與年譜。與方苞同時的士人，注意的是方苞的經學與文章。方苞弟子王兆符（1681-1723）、程峯（1687-1767）與官獻瑤（1703-1782）分別於方苞在世時的雍正、乾隆間編輯《方苞集》。⁷⁶雷鉉（1697-1760）與沈廷芳（1711-1772）則在方苞甫逝世時，撰述〈方望溪先生行狀〉與〈方望溪先生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數人都是向方苞執弟子禮的正式弟子，⁷⁷但都不是桐城同鄉。⁷⁸方苞弟子寫作序言與傳記時，是在程朱理學主導朝野學術風氣的時期。⁷⁹因此，他們並不需要刻意迴避程朱理學。然而，相對於十九世紀的桐城士人，方苞弟子的敘述是全面地介紹方苞的學術成就，並不強調方苞的程朱理學。

方苞弟子們編纂《方苞集》時的序言，程朱理學佔的比重相當低。儘管王兆符於雍正元年（1723）的序言，轉述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之言，成為此後方苞，甚至是桐城派以程朱為宗的主要依據。然而，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刻意凸顯程朱理學的文字。方苞同學顧琮（1685-1754）在乾隆五年（1740）的序中，指出方苞的文學成就，並敘述方苞的品德操守。顧琮也記錄方苞自言少時「好文而不好學」，感嘆若能如好文般好學，必將更有所得。在此，顧琮雖然意在表現方苞的謙遜，但也顯示出方苞對文學的投入及表現。另一位向方苞學習時文、經學與古文的程峯，也在遍覽方苞的文章後，認為方苞之文「循韓、歐之軌跡，而運以左、史義法」，雖然程峯指出方苞作文

⁷⁶ 《方苞集》從雍正至宣統不斷刊行，以程峯乾隆十一年（1746）、官獻瑤乾隆十三年（1748）與戴鈞衡咸豐元年本最完善。其中，戴鈞衡本面世後，成為最通行的版本。詳見任雪山，〈《望溪集》版本及其學術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第6期，頁64-71。

⁷⁷ 任雪山，〈《望溪集》版本及其學術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第6期，頁69。

⁷⁸ 王兆符為直隸順天人，程峯為安徽歙縣人，官獻瑤為福建安溪人，雷鉉為福建寧化人，沈廷芳為浙江仁和人。

⁷⁹ 雖然，乾隆時期，學術風氣漸漸由宋學轉向漢學，但乾隆皇帝早年仍重視程朱心性之學，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修纂四庫全書時，都沒有太大的改變。一直要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後，才開始多次出現質疑理學的言論。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卷23期2（2005年12月），頁83-128。

是「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但卻未特別捻出程朱理學。⁸⁰弟子官獻瑤的序言，也不刻意描繪程朱理學。儘管官獻瑤自身頗有理學素養，⁸¹但他得到王兆符與程峯編纂的《方苞集》後，特地抄錄經、史的部分，另外刊行《方望溪先生讀經史文鈔》。⁸²他在序言中記載當初欲從方苞學習古文，但方苞令他先研究《周禮》。官獻瑤以這段往事說明方苞的文學表現奠基於經學素養，同樣未提及方苞的程朱理學面向。

雷鋹與沈廷芳關於方苞學行的記述，也反映相同的特色。雷鋹與沈廷芳都親近理學，他們在其他文字也明白表示這點。⁸³但兩人於乾隆十四年（1749）的傳記敘述都不太提及方苞的程朱理學，而是集中談論方苞的經學以及特別是文學的成就。雷鋹〈方望溪先生行狀〉開筆介紹方苞的家世，以及幼年讀「經書」與「古文」後，立刻敘述方苞成年遊京師，受到李光地（1642-1718）讚賞的往事——李光地讚賞方苞文章「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雷鋹接著指出方苞是因為文學成就受到皇帝的讚賞。整體而言，雷鋹以方苞的文學與經學為重點，隻言未及理學。⁸⁴接著，沈廷芳以雷鋹所著行狀為底本撰寫傳記。⁸⁵沈廷芳撰述策略及內容與雷鋹相似，他筆下的方苞論學與指導都集中在禮學。雖然沈廷芳稍微提及與方苞閒談程朱相關書籍，但他說明方苞的教訓時，一則記錄雍正六年（1728）拜師時，方苞向沈廷芳說明，其門牆是「以治

⁸⁰ 《方苞集》，下冊，〈原集三序〉，頁 906-909。

⁸¹ 林春溥（1775-1862）稱官獻瑤論心性剖析精微。此外，官獻瑤也曾擔憂「學之不講，理之不明」，因此建議雷鋹鼓舞諸生投入性理學，推廣理學名臣陸隴其的《松陽講義》。見〔清〕官獻瑤，《石谿文集》（清道光庚子年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林春溥，〈序〉，頁 1b；〔清〕官獻瑤，《石谿文集》，卷 2，〈與翠亭先生書〉，頁 19a-19b。

⁸² 〔清〕官獻瑤，《石谿文集》，卷 1，〈方望溪先生讀經史偶鈔序〉，頁 1a-2b。

⁸³ 如沈廷芳著有《理學淵源》，並序其私淑師勞史遺書。雷鋹也發揚數位理學名儒的相關文字。徐世昌等編，沈芝盈、梁韻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冊 2，卷 46，〈餘山學案〉，頁 1878-1880；〔清〕沈廷芳，《隱拙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乾隆刻本），冊 298，卷 37，〈餘山先生遺書序〉，頁 15b-16a，總頁 515；〔清〕雷鋹，《經筵堂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清嘉慶十六年寧化伊氏秋水園刻本），冊 285，卷上，〈張楊園先生全集序〉、〈困學錄序〉，頁 28a-b、34a-b，總頁 20、23。

⁸⁴ 〔清〕雷鋹，《經筵堂文鈔》，卷下，〈方望溪先生行狀〉，頁 32a-35a，總頁 60-62。特別是 32a、34a，總頁 60、61。

⁸⁵ 〔清〕沈廷芳，《隱拙齋集》，卷 38，〈望溪文集後序〉，頁 2a，總頁 516。

經爲務」；一則記載方苞教導沈廷芳作古文的原則。⁸⁶稍後，沈廷芳因爲發現方苞傳記以事跡爲重，忽略了文章成就，因而作〈望溪文集後序〉點明方苞文章的造詣。⁸⁷值得一提的是，全祖望（1705-1755）與方苞密切論學，他的觀點雖與前述方苞弟子略有不同，但也未提及理學。全祖望認爲世人稱讚方苞之文章，是無法完整呈現方苞的學行表現。然而，他心目中的方苞是兼顧經術與文章，並富有世濟民之志。從此可見，對全祖望而言，方苞在文章之外，值得爲世人關注的成就也不是理學。⁸⁸總之，方苞成就以經學與文章爲重，因此弟子以及學友特別點明這方面，他們不特別強調程朱理學的面向。

（二）桐城後輩筆下的方苞

相對於方苞的受業弟子及方苞學友，十九世紀的桐城後輩特別加強方苞程朱理學的一面，並忽略方苞兼顧文道的言論。戴鈞衡主導編輯方苞文集，蘇惇元則編纂方苞年譜。他們編纂文集與年譜的底本，主要是前述王兆符、程崑與官獻瑤的《方苞集》，以及雷鋹與沈廷芳的傳記資料。

戴鈞衡認爲，方苞文章有超出文章藝術性之外的部分，值得流傳於世。但他指的並非前述方苞弟子強調的經學，而是程朱理學。戴鈞衡指出，歷史流傳下來的許多文章，大多只是因爲富有藝術性，足以供人賞玩，因此吸引人們蒐集與編輯。他感嘆方苞之文「有足傳於文章外者」，又怎麼可以任其散落？對戴鈞衡而言，方苞文章的底蘊與深層意義，正是程朱理學。戴鈞衡所謂「足傳於文章外者」，正是希望讓世人了解，方苞引人注目的文章表現，其底蘊與內容實爲程朱理學。⁸⁹戴鈞衡並不否定方苞的文章成就，也不反對世人喜愛其文章。但他指出，方苞文章受人喜愛，正是因爲他以程、朱爲本，因此無論是文章甚至是經說，都蘊含了精深醇正的程朱義理。⁹⁰戴鈞衡甚至以此標準，比較

⁸⁶ [清]沈廷芳，《隱拙齋集》，卷41，〈方望溪先生傳〉，頁3b-51，總頁539-540。

⁸⁷ [清]沈廷芳，《隱拙齋集》，卷38，〈望溪文集後序〉，頁1a-2a，總頁516。

⁸⁸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清嘉慶九年史夢蛟刻本），冊302，卷17，〈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頁1a-7a，總頁485-488。

⁸⁹ [清]戴鈞衡，〈望溪先生集外文跋〉，收入《方苞集》，下冊，頁919-920。

⁹⁰ [清]戴鈞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收入《方苞集》，下冊，頁914。

方苞與其他的文章作者。戴鈞衡認為，方苞之所以優於以往的古文家，不是因為他有經學基礎，而是因為方苞信奉程朱，對道有深厚的認識，但卻又不至於被義理所拘束而無法恣意揮灑：

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為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⁹¹

戴鈞衡稱讚方苞見道深刻，他不但將方苞學術的重點，轉移以程朱理學為重。同時，若比較乾隆時期稱讚方苞「文章介韓、歐之間」、「循韓、歐之軌跡」與「與韓、歐爭等列」的說法，戴鈞衡甚至似乎認為方苞有深厚的程朱理學底蘊，文章成就高於因文見道的韓愈與歐陽修。綜而言之，在戴鈞衡的相關序言中，他預設義理、詞章與經學的架構中，義理是最重要的，他特別標明方苞以程朱理學為核心的學術特色，作為世人認識方苞的關鍵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戴鈞衡的序言強調方苞兼顧文與道，但戴鈞衡指出見道深者，可能反為道所束縛，作文不能活潑變化。換言之，戴鈞衡留意到文章內容與書寫形式間的扞格，也暗示了文、道之間可能存在的張力。

時間稍前，蘇惇元編纂的方苞年譜，不但也凸出程朱理學，並且更明顯地展現文與道之間的偏重。蘇惇元的說法不僅得到戴鈞衡的認同，蘇惇元編纂的年譜更成為戴鈞衡編輯的《方苞集》的附錄。⁹²蘇惇元強調方苞學行以程朱為宗，不滿世人僅愛好方苞的文章，而忽略方苞的學行經濟與文之載道的一面。⁹³比較蘇惇元編纂的年譜，以及前述雷鉉與沈廷芳所呈現的方苞樣貌，我們可以發現，在戴、蘇二人眼中，方苞所明之道與所析之理，同樣是指程朱理學。

蘇惇元編纂方苞年譜時，為了強調程朱理學，在史實選擇上展現了他的偏重。方苞與顏李學色彩濃厚的王源（1648-1710）與李塉（1659-1733）的交往，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蘇惇元引用方苞〈李剛主墓誌銘〉中記錄其導正王源與李

⁹¹ [清]戴鈞衡，〈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收入《方苞集》，頁 905-906。

⁹² [清]戴鈞衡，〈望溪先生年譜序〉，收入《方苞集》，頁 915-916。

⁹³ [清]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序〉，收入《方苞集》，頁 916-917。

堪，讓他們放棄過去抨擊程朱的言論，甚至促使他們以方苞的意見修正顏元（1635-1704）的著作。⁹⁴然而，這段往事的史實基礎相當薄弱。王源與李堪不但從未放棄顏元學，在當時更反過頭試圖說服方苞遵從顏元學術。⁹⁵換句話說，方苞與王源、李堪僅為互相論學的學友，並不是單方面導正與信從的關係。李堪的弟子即反駁方苞〈李剛主墓誌銘〉的說法，批評方苞不但隻言未及李堪的道德學業，甚至造謠了李堪的改宗。⁹⁶這段往事的記載，清楚顯示蘇惇元編纂年譜的偏重與取捨。

相對於戴鈞衡，蘇惇元清楚地指出文與道之間的張力，並表明「道」與「理」應主導文章的寫作與表現。蘇惇元認為程朱以後理學大明，作古文必須與「道」合。他指出古文之「法」不可枚舉，難以遵循。因此只有以五子之「理」為準繩，否則文章的理路就會不清晰。⁹⁷蘇惇元推崇方苞為宋以降最好的古文家，正是因為方苞成功地融合貫通程朱義理與韓歐文章。因此，方苞的文章足以「載道而行遠」而不是「虛浮之文」。同時，他也希望透過方苞年譜，告誡世人「為文必以載道為貴，毋徒為浮靡奇詭之辭」。⁹⁸

除了強調方苞以程朱理學為學術根柢，蘇惇元在年譜中的論述策略，也直接凸顯了方苞在詩文與理學之間的取捨。在康熙廿五年（1686），方苞十九歲的條目下，蘇惇元編入一條往事。他記錄方苞幼時，想要效仿父親及友人作詩唱和。但父親勸戒方苞不應該耗費心力於「小道」。從此之後，方苞絕意於詩。接著，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廿四歲條目，蘇惇元雖然也編入方苞初入太學，李光地稱讚方苞古文的往事。但蘇惇元立即接續了另外兩件往事，消解古文在方苞生涯中的意義。第一，萬斯同（1638-1702）勸方苞切勿沉溺於古文，方苞因此「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義」。蘇惇元的說法明顯與歷史不符——

⁹⁴ [清]蘇惇元，〈方苞年譜〉，收入《方苞集》，下冊，頁878。

⁹⁵ 暴鴻昌，〈論方苞與康熙時期的理學〉，《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2期，頁157-165。

⁹⁶ [清]馮辰編，[清]劉調贊續編，[清]惲鶴生訂，[清]李鐸重訂，《李恕谷先生年譜》，收入《清初名儒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冊16，卷5，頁33a，總頁585。

⁹⁷ [清]蘇惇元，《遜敏錄》，卷3，頁1a、3b，總頁34、35；卷4，頁1a，總頁39。

⁹⁸ [清]蘇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譜序〉，收入《方苞集》，下冊，頁916-917。

方苞一生除了經學外，同樣也持續於古文的創作與理論思考。在此，蘇惇元雖然如同前述方苞弟子強調方苞的經學，但蘇惇元對方苞學術的總評，則特別強調方苞以宋儒為宗，說經是推衍宋儒而來。⁹⁹蘇惇元這樣的安排，再次顯示他將詩文視為「小道」的預設。第二，蘇惇元既然認為方苞從此放棄詩文小道，他接著便編入方苞投入理學「始讀宋儒書」的起點。蘇惇元引用方苞〈與劉拙修書〉，說明方苞入京後一改過去重文藻、喜事功，而輕視宋儒的態度，深入探索理學。蘇惇元並引用方苞抨擊背離北宋五子者，皆為「學之蠹」的原文作為依據。¹⁰⁰最後，蘇惇元編入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的著名說法。蘇惇元摘取方苞這些著重於理學的言行，在雷鉉、沈廷芳與全祖望的記述中都不存在。¹⁰¹總而言之，在康熙三十年條目下，蘇惇元一氣呵成地先是列出李光地之稱讚，接著是萬斯同的勸戒，然後是方苞自述投入理學的衛道言論。在這樣的安排下，蘇惇元呈現方苞志向的發展過程與重心，不僅是以程朱理學為經學與文學的核心，甚至因為投入理學而排斥詩文的興趣與創作。

比較方苞弟子們與十九世紀桐城後輩的纂述策略與內容，我們可以發現桐城後輩意識到文章與理學間的矛盾，而他們最關心的是方苞的程朱理學面向。他們的堅持甚至比其師方東樹更為強烈。比對方東樹兩篇經過弟子修改後的方苞年譜序文，將可見到師徒兩輩之間的顯著差異。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戴鈞衡收錄了大量序跋作為《方苞集》的附錄，但都沒有收入方東樹撰寫的相關文章。

方東樹顯然是以「文家」的角度看待方苞的。他雖然預設了文學與理學之間的張力，但相對於戴鈞衡等人明顯偏重程朱理學，方東樹則比較同情方苞文學創作的一端。方東樹在〈書望谿先生集後〉中，以文章寫作的角度評析方苞文章的優劣，他不但沒有強調程朱理學的優先性，反倒是感嘆程朱理學限制了方苞寫作時的發揮。¹⁰²另外，方東樹為蘇惇元代作的〈方望谿先生年譜序〉草

⁹⁹ [清]蘇惇元，〈方苞年譜〉，收入《方苞集》，下冊，頁 867-868、890。

¹⁰⁰ [清]蘇惇元，〈方苞年譜〉，收入《方苞集》，下冊，頁 869-870。

¹⁰¹ [清]蘇惇元，〈方苞年譜〉，收入《方苞集》，下冊，頁 870。

¹⁰² [清]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收入《方東樹集》，卷 5，〈書望谿先生集後〉，頁 312-313。

稿中，也沒有特別闡發方苞程朱理學的一面。相對於蘇惇元在定稿中，申明方苞之文章是以「載道」為貴，而不僅是展現寫作技巧的虛浮之文。方東樹的代作除了提及「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一語外，並沒有其他特別說明。¹⁰³

方東樹與後輩的差異，更明顯地表現在方東樹道光廿七年（1847）以自己名義所寫的序文，以及弟子方宗誠之後的修改。同治六年（1867），方宗誠編纂《儀衛軒文集》時，對方東樹原文作了若干刪訂。學者指出，方宗誠修改、潤飾方東樹的學術與思想立場，並且消解方東樹原稿揄揚方苞、劉大櫟與姚鼐太超過的弊端。¹⁰⁴在此之外，筆者認為方宗誠的刪改還有另一層的學術考量——淡化方苞古文家的面貌。

嚴雲綬點校的《方東樹集》，將方宗誠的修改附註於原文後，有助於比對。¹⁰⁵以下為方東樹〈望谿先生年譜序〉原文與方宗誠修改後的序文，筆者將刪改處加底線標示，並附加編號。方東樹：

統觀前後，碩德名賢數十族，而於文學尤推方氏。方氏在明則有密之先生，在我朝則有望谿先生。密之博綜淹貫，靡所不通，擅聲一代，然以語文章經學之廣大精微，經世立事之宏綱鉅用，（1）實皆不逮望谿。即以古文一道論之，能得古作者義法、氣脈、韓歐相傳之統緒，
（2）在明推歸太僕熙甫，昔人號稱絕學，惟望谿克承繼之，實能探得其微文大義，不傳之祕，以尊成大業。望谿而後，則有劉學博海峰，姚刑部惜抱，學者宗之，以比揚馬韓歐，
（3）並稱曰「方、劉、姚」，翕然無異論。夫三先生皆各以其才、學、識自成一家，自有千古，蓋非特一邑之士，而〔實〕天下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實百世之師。

¹⁰³ [清]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收入《方東樹集》，卷4，〈方望谿先生年譜序（代）〉，頁301。

¹⁰⁴ 田豐，〈存其醇而去其疵——方宗誠刪訂方東樹遺文述評〉，《古典文學知識》，2018年第2期，頁81。

¹⁰⁵ [清]方東樹，《考槃集文錄》，收入《方東樹集》，卷4，〈望谿先生年譜序〉，頁302-303。承集刊編輯同仁A所示，兩文尚有些許文字異同。但這些差異與本文論證無關，在此就不羅列，避免枝蔓。本文仍以嚴雲綬的校勘說明為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原文。

以愚究論其實，(4)若從其多分言之，則望谿之學，海峰之才，惜抱之識，尤各臻其獨勝焉。然若置其品題，就其經學義理，以及所敷奏設施之實絜之，劉、姚則偏全大小，哀然不侔，即同時若安谿、臨川諸公比肩同志，所謂如驂之靳，然亦皆似不及之。先生書在海內，名在國史。

方宗誠刪改爲：

統觀前後，碩德名賢數十族，而於文學尤推方氏。方氏在明則有密之先生，在我朝則有望谿〔溪，下同〕先生。顧密之博綜淹貫，靡所不通，擅聲一代。而以語文章經學之廣大精微，經世立事之宏綱鉅用，(1)實皆不逮望谿能得古作者相傳之統。(2)〔刪去〕實能探得其微文大義，不傳之祕，以尊成大業。望谿而後，則有劉學博海峰，姚刑部惜抱，學者宗之以比揚馬韓歐。(3)〔刪去〕而以愚究論其實，(4)〔刪去〕則望溪之經學、義理，以及所敷奏設施之實絜之，劉、姚偏全大小，哀然不侔。即同時若安谿〔溪〕、臨川諸公比肩同志，所謂如驂之靳，然亦皆似不及焉。先生書在海內，名在國史。

方宗誠對〈望谿先生年譜序〉做了一段改寫，三段刪除。整體而言，方東樹的敘述重點集中在古文，他較著重方苞的古文成就，並且在古文表現上，平等看待方苞、劉大櫨與姚鼐的能力。比較之下，方宗誠刪改後的序文，則強調方苞文章、經學與經世的整體成就，並因此不將方苞與劉大櫨、姚鼐等而視之。

首先，在序文(1)、(2)處，方東樹原本的說法強調方苞在古文上，接續韓愈、歐陽修以至於明代歸有光之文統。然而，方宗誠刪去(1)、(2)「即以古文一道論之」直到接續歸有光一段，並改寫爲「〔方以智〕實皆不逮望谿能得古作者相傳之統」。經過方宗誠的改寫，此段序文呈現出方苞的成就，便包括文章、經學與經世，而不僅局限於古文。接著，方東樹儘管同意方苞在經學與義理，甚至是經世實務上的建言，都優於劉大櫨與姚鼐。但方東樹原文的(3)、(4)，則在古文的表現上，稱讚方、劉、姚三人分別在學、才、識各

有勝場，三人並列為「百世之師」。在此，方宗誠則直接刪去（3）、（4）兩段，直接呈現方苞優於劉大櫨與姚鼐，並在文氣上更直截地顯現方苞的表現高過同時的李光地與李紱（1673-1750）兩位「理學名臣」。總之，相較於方苞與姚鼐等人試圖建立文統，強調詞章之學的地位。在十九世紀，鄙視文人的風氣越來越強時，¹⁰⁶方宗誠則不願意方苞僅以古文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眼中。閱讀方宗誠修改後的序文，讀者會更加注意到方苞的全面，而非將方苞視為一位「文苑傳」的古文家。

總之，蘇惇元、戴鈞衡與方宗誠的思想傾向，以及他們對桐城學術的描繪，展現了桐城派學術中本身存在的理學與文學的張力。儘管桐城派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但對十九世紀初的桐城後輩而言，他們壓抑文學成就的比重，極力撇除文學的「盛名」，選擇繼承並凸顯程朱理學的一面。他們的行動一方面呼應了十九世紀以來的理學氣氛，也是為了避免世人徒以「文章」表現看待桐城學術。值得注意的是，方宗誠等人提高理學，卻沒有成功地消弭這股理學與文學的張力。此後，這股張力仍以不同的形式延續下去。桐城這場理學與文學消長的故事，不僅延續至十九世紀末，甚至在二十世紀也再次出現。

五、結 論

方宗誠等人的努力並沒有達到一錘定音的效果。十九世紀末，部分士人將中國的積弱歸咎於「儒學傳統」，也注意到應以文學「讀寫技能」的一面接引西方學問。¹⁰⁷在此劇變的時刻，方宗誠等人的弟子輩不再專注於程朱理學，反倒提倡桐城學術文學與藝術性的面向。他們或有意強調桐城學術的文學面向，

¹⁰⁶ 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呼應了清代常見「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價值觀。此種觀念清代以前即有，到了十九世紀，士人更是以入「儒林傳」為優，不願入「文苑傳」的討論；士人並有許多鄙視「文人」的言論，可見蔡長林，《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頁 32-34。

¹⁰⁷ 陸胤指出，晚清新學制的語言教學改革，帶有強烈的應用導向，不僅以應用文為中心，更將文字、文章限定為知識的載體與交際工具。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 5。

或以平等的態度看待各種學問，使得文學擺脫方宗誠等人所加諸的理學「枷鎖」。這正凸顯了方宗誠等人強調程朱理學的特殊之處。最後，筆者將以吳汝綸以及方宗誠弟子馬其昶（1855-1930）與陳澹然（1859-1930）為例，簡單說明這種反轉。深入的討論，需要另以專文處理。

吳汝綸警惕理學對文學的負面影響，更提出一套以「詞章」、「文學」來接納西學，調整中西學術的新方案。¹⁰⁸吳汝綸同時兼具晚清桐城縣人以及桐城派代表人物的雙重身分，他的言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吳汝綸身處與方宗誠等人極為不同的政治與思想背景。因此，他相對地重視文學的地位，直言方宗誠的理學信仰拖累了文章寫作。他引述曾國藩的批評，認為方宗誠忽視「造句」與「音節」這類文章表現技巧與藝術性的層面。吳汝綸認為，這些毛病正來自於方宗誠受到宋人語錄影響，論理論學之處太多。吳汝綸的說法暗示了理學內容與作文表現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¹⁰⁹吳汝綸也表示理學會對文學造成傷害。他雖然同意程朱理學是桐城縣的「家法」，但程朱義理並不能主導文章寫作。吳汝綸強調文、道分離，才是作文章的正途。¹¹⁰吳汝綸持此原則教導後輩，如他便勸與桐城學術頗有淵源且信奉理學的唐文治（1865-1954），作文應該擺脫理學的束縛。¹¹¹從此可見，吳汝綸正在重新調整桐城學術的特質與發展方向。相較於前述蘇惇元等人強化管理學的主導的地位，吳汝綸則試圖拉開理學與文學的距離，強調文章寫作的表現形式，這反而與方苞、姚鼐所具有的文章獨立意識，更為接近。儘管這個方向看似與蘇惇元等人相反，但他們都是在重新安排理學與文學的輕重——一邊是主張以理學為主導，貶低文學創作的意義；一邊是提倡文學的獨立性，避免理學對文學的侵擾。

¹⁰⁸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166-171；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

¹⁰⁹ [清]吳汝綸撰，《日記·品藻》，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冊 4，卷 13，「戊辰潤四月庚申」，頁 792-793。

¹¹⁰ [清]吳汝綸撰，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冊 3，〈答姚叔節書〉，頁 138-139。

¹¹¹ [清]唐文治，《茹經堂文集三編》（上海：上海書局，1996，影印 1935 年版），收入《民國叢書》，編 5，冊 95，卷 5，〈桐城吳摯甫先生文評手蹟跋〉，頁 24b。

方宗誠弟子們同樣具有編纂鄉里前輩傳記與文獻的志向，但卻呈現相當不同的特色。馬其昶相當尊重文學的獨立性。¹¹²馬其昶編纂的《桐城耆舊傳》是桐城人物與學術最重要的文獻之一。馬其昶不排斥程朱理學，但他更持平地敘述桐城前輩的學行。《桐城耆舊傳》是以平等的態度看待桐城先賢各方面的學術表現，並不特別強調理學。這在方苞、劉大櫟、姚鼐與方東樹的撰述中特別明顯。¹¹³馬其昶筆下的桐城，因此呈現出較多的文學性與藝術性。

陳澹然主導編纂的《方柏堂先生事實考略》是另外一個例子。陳澹然對桐城派有較多的批判，他雖然師從方宗誠學習古文，但不滿桐城派拘守義法，並告誡年輕人作文應該以史書為範本。¹¹⁴這裡，陳澹然可能是批判桐城的寫作義法，也可能是不滿以程朱義理為準繩。但無論如何，他試圖超出桐城派的規範。他在《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並不刻意淡化文學的一面，尊重並同意方宗誠以程朱理學為宗，但也呈現方宗誠博雜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陳澹然特別強調方宗誠的古文寫作理論、創作與成就。¹¹⁵然而，這些面向正是方宗誠全心投入理學後，窮其一生極力掃清的「惡習」。¹¹⁶相較於方宗誠等人的作法，我們在《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不再看到理學與文學，甚至與其他學問之間的張力，也沒有看到由理學領導其他學問的主導性地位。陳澹然的編纂策略，與傳主方宗誠強調師友們程朱理學的方針，正好相反。¹¹⁷《桐城耆舊傳》與《方柏堂先生事

¹¹² [清]馬其昶，《抱潤軒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民國十二年京師刻本），冊781，卷5，〈清史文苑傳序〉，頁15b，總頁262。

¹¹³ [清]馬其昶著，毛伯丹點注，《桐城耆舊傳》，卷10，〈方植之先生傳〉，頁396-397；卷8，〈方望溪先生傳〉頁305-308；卷10，〈姚惜抱先生傳〉，頁362-364；卷9，〈劉海峰先生傳〉，頁324-327。

¹¹⁴ [清]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直介堂叢刻本），冊6，卷8，頁4a，總頁758。另外，汪辟疆回憶陳澹然嚴厲批判桐城派以及他們的寫作風格。汪辟疆註見章士釗遺稿，汪辟疆增注，〈論近代詩家絕句〉，《江海學刊（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頁77。

¹¹⁵ [清]陳澹然，《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學問略第二〉，頁1a-2b，總頁614；頁35a-41a，總頁631-634

¹¹⁶ [清]吳廷棟，《拙修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同治十年六安求我齋刻本），冊583，卷9，〈與方存之大令書〉，頁40ab，總479。

¹¹⁷ 學者田豐發現方宗誠修正方東樹在〈辨道論〉中表達儒、釋可以融通的想法，並加強方東樹的性善立場。此外，方宗誠也於方東樹其他文章凸顯「敬」的工夫。田豐，〈存其醇而去其疵——

實攷略》呈現桐城豐富多元的學術傳承，桐城士人「歸宗」於程朱理學的經歷，以及方宗誠等人刻意凸顯的程朱理學傳統，遂淹沒在「桐城文士學風與兼容傳統」的敘事之中。總之，吳汝綸等人的理論以及對桐城學術的敘述，凸顯了方宗誠等人強調程朱理學的特殊之處。

這股張力在二十世紀並未消失。桐城派學術先是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衝擊。接著，在 1949 至 1980 年，儘管毛澤東相對讚許桐城派的藝術性，但他否定孔孟程朱，卻連帶波及桐城派。¹¹⁸毛澤東的評價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語文政策。此後，中國學者多將桐城派與程朱理學畫上等號，一併批判。1975 年，桐城文教局甚至成立「桐城批判小組」，宣稱桐城學派為「反動的儒家學派」。¹¹⁹直到 1980 年代，桐城派研究雖然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低潮，相關刊物、研究與研討會大量出現。¹²⁰但同時，理學與文學的張力也再次出現。少年時代一同受到桐城派學術滋養的吳孟復（1919-1995）與舒蕪（原名方管，1922-2009），前者被譽為「桐城派最後一位大師」，後者則為方宗誠的曾孫。他們對於桐城派的態度，有著熱情與冷淡的鮮明對比。

吳孟復與舒蕪對於桐城派的評價相當極端，但兩人的評價均涉及桐城派的文學屬性以及與程朱理學的關係。舒蕪大力抨擊桐城派，他認為桐城派的本質為宋明理學，正是為「吃人」的道學服務。¹²¹相反地，吳孟復對桐城派抱持著

方宗誠刪訂方東樹遺文述評》，《古典文學知識》，2018 年第 2 期，頁 78-80。另外，方宗誠晚年對師友遺著的「改造」，請見丘文豪，〈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21 年 7 月），頁 223-226。

¹¹⁸ 毛澤東青年時期，其實頗欣賞桐城派。1949 年後，雖然批判桐城派，但也肯定桐城派的藝術性。從此可見，毛澤東具有將桐城派的理學與文學分開評價的色彩。王達敏，〈毛澤東與桐城派〉，《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6 期，頁 64-70。

¹¹⁹ 見王達敏，〈吳孟復：桐城派最後一位大師〉，《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6 期，頁 47-48。

¹²⁰ 高黛英，〈20 世紀桐城派研究述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6 期 2，頁 114-120。

¹²¹ 舒蕪，〈「桐城謬種」問題之回顧〉、〈「桐城謬種」問題之回顧（續完）〉，《讀書》，1989 年第 11 期，頁 31-39；1989 年第 12 期，111-118。

溫情與敬意，他陸續發表相關研究回應舒蕪的批評。¹²²然而，吳孟復也極力撇清桐城派與理學的關係。他批評桐城思想的後繼者受到理學思想的禁錮，中了程朱理學的毒。吳孟復批評他們不但思想境界低，且所作文章僅為陳詞爛調。吳孟復也不滿蘇惇元等人將方苞打扮成篤信程朱的醇儒。¹²³吳孟復先是區分學派與文派的差別，強調桐城是以古文寫作為特色的一種「藝術」文派。接著，他分析「桐城理學」的內涵，淡化方苞以程朱為尊的一面。他強調方苞之理學實為具有革命性的顏李學，也凸出劉大櫟批判程朱學，推崇陽明學的一面，認為劉大櫟思想淵源為泰州學派。然而，吳孟論的說法忽視劉大櫟之學術思想在桐城派中並沒有造成太大影響的事實。吳孟復藉由這些學術論證，指出桐城之理學為顏李學派與左派王學，而非八股、保守、為政權服務的程朱理學。總之，舒蕪對桐城派的厭惡，是因為他認為桐城派的文學主張，正是用以表達程朱理學；而吳孟復則為了提倡桐城派，極力使桐城「文派」與程朱理學劃清界線。從此可見，在二十世紀末以學術形式出現的爭論，仍然充分顯示桐城派與程朱理學，存在著相當的內在張力。

綜而言之，桐城學術的發展本身，以及後繼者面對著前賢的學術遺產時，難以避免地與全國性的政治、社會與學術氛圍緊密的纏繞在一起。在巨大的政治與社會變局下，除了發生我們熟悉的漢宋學術更迭、經世思潮以及西學大舉傳入等等的學術史大敘事外，各種暗潮下的思想也同樣受到波及，產生種種的碰撞與變化。一直到二十世紀以至於當代，儘管理學與文學的關係，僅侷限在學者的討論中。但書寫內容與形式孰輕孰重的討論，仍未停歇。甚至在臺灣當前爭論不休的文言文教育、國文課程教材的選編，仍可見到這股張力的存在。

總之，以桐城派這麼一個具有兼顧文、道的學派為例，文與道的張力並不容易調和。在不同的客觀條件下，往往呈現此消彼長的發展。桐城士人對學術傳統的安排與重建，提示了一條理學 / 文學（義理 / 詞章）的清代學術思想史

¹²² 楊懷志，〈桐城派研究之回顧〉，《斯文》，輯 5（2020 年 4 月），頁 159-176。本文寫作於 1990 年，發表於 2020 年。

¹²³ 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頁 54、69。

研究角度。同時也提醒我們，儘管桐城派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但也不能簡單將其與地域特色畫上等號。我們應該考慮地域士人在面對、形塑與接受先賢的學術遺產時，具有的主動性與能動性，並考慮社會政治環境所給予的刺激與制約。

徵引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清〕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5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民國十五年京華印書局刊本。
- 〔清〕方宗誠，《柏堂集前編》、《柏堂集次編》、《柏堂集續編》、《柏堂集後編》、《柏堂集餘編》、《柏堂集補存》、《柏堂集外編》，均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 〔清〕方東樹，嚴雲綬點校，《方東樹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 〔清〕方苞著，劉季高點校，《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02，影印清嘉慶九年史夢蛟刻本。
- 〔清〕吳汝綸著，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吳汝綸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2。
- 〔清〕吳廷棟，《拙修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83，影印清光緒九年六安求我齋刻本。
- 〔清〕李祖陶，《國朝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670，影印清道光十九年經訓堂刻本。
- 〔清〕沈廷芳，《隱拙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98，影印清乾隆刻本。
-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76，影印清咸豐元年刻本。
- 〔清〕官獻瑤，《石谿文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庚子年刊本。
- 〔清〕姚瑩，《東溟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49，影印清同治六年姚濬昌安福縣署刻中復堂全集本。
-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77，影印清嘉慶三年刻本。
-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77，影印清嘉慶三年刻本。
- 〔清〕唐文治，《茹經堂文集三編》，收入《民國叢書》，編 5，冊 95，上海：上海書局，1996，影印 1935 年版。
- 〔清〕馬其昶，《抱潤軒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781，影印民國十二年京師刻本。
- 〔清〕馬其昶著，毛伯丹點注，《桐城耆舊傳》，合肥：黃山書社，1990。
- 〔清〕梅曾亮，《柏硯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52，影印清咸豐六年楊以增楊紹穀等刻民國七年蔣國榜補修本。
- 〔清〕廖大聞修，〔清〕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冊 1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刻本。
- 〔清〕許鼎，《許玉峯先生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重刊本。
- 〔清〕陳澹然，《方柏堂先生事實攷略》，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冊 52，北京：線裝書局，2003，影印清光緒間木活字本。
-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長沙：嶽麓書社，1994。

- 〔清〕鄂爾泰等纂，《聖祖仁皇帝實錄》，冊 1，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馮辰編，〔清〕劉調贊續編，〔清〕惲鶴生訂，〔清〕李鐸重訂，《李恕谷先生年譜》，收入《清初名儒年譜》，冊 1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 〔清〕雷鉉，《經筵堂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85，影印清嘉慶十六年寧化伊氏秋水園刻本。
- 〔清〕管同，《因寄軒文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32，影印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 〔清〕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收入《叢書集成三編》，冊 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直介堂叢刻本。
- 〔清〕劉聲木撰，徐天祥點校，《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合肥：黃山書社，1989。
- 〔清〕蘇惇元，《遜敏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5，冊 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影印清同治六年儀宋堂刻本。
- 徐世昌等編，沈芝盈、梁韻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專著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 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 王德威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2021。
-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田富美，《清代中晚期理學研究：思想轉化、群體建構與實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
- 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 俞樟華、胡吉省，《桐城派編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 姜書閣，《桐城文派述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 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合刊）》，臺北：里仁書局，1995。
- 章太炎、劉師培等撰，羅志田導讀，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許總主編，《理學文藝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 曾光光，《桐城派與清代學術流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 蔡長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 蔡長林，《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冊4，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龔書鐸主編，史革新、李帆、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全三冊，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 Bol, Peter.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三、論文及專文

- 王達敏，〈毛澤東與桐城派〉，《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64-70。
- 王達敏，〈吳孟復：桐城派最後一位大師〉，《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頁39-48。
- 丘文豪，〈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21年7月。
- 包弼德，〈美國宋代研究的近況〉，《新史學》，卷6期3，1995年9月，頁185-205。
- 田豐，〈存其醇而去其疵——方宗誠刪訂方東樹遺文述評〉，《古典文學知識》，2018年第2期，頁76-85。
- 任雪山，〈《望溪集》版本及其學術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第6期，頁64-71。
- 李卓穎，〈地方性與跨地方性——從「子游傳統」之論述與實踐看蘇州在地文化與理學之競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本82分2，2011年6月，頁325-398。
- 李爽學，〈八方風雨會「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期10，2016年6月，頁151-177。
-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卷23期2，2005年12月，頁83-128。
- 高黛英，〈20世紀桐城派研究述評〉，《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頁114-120。
- 張晨宜、曾光光，〈桐城派研究學術史回顧〉，《船山學刊》，2006年第1期，頁172-174。
- 張循，〈清代中期的「文士」與「文章」——讀章太炎《馗書·清儒》篇書後〉，《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57，2017年6月，頁141-176。
- 張壽安，〈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2，2006年6月，頁53-111。
- 張壽安，〈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學海》，2015年第2期，頁186-204。
- 章士釗遺稿，汪辟疆增注，〈論近代詩家絕句〉，《江海學刊（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頁72-82。

- 曾光光，〈變法維新思潮中的吳汝綸與桐城派〉，《江淮論壇》，2001 年第 3 期，頁 94-98。
- 曾光光，〈徘徊於「文」、「道」之間的桐城派〉，《江淮論壇》，2004 年第 1 期，頁 150-155。
- 舒蕪，〈「桐城謬種」問題之回顧〉，《讀書》，1989 年第 11 期，頁 31-39。
- 舒蕪，〈「桐城謬種」問題之回顧（續完）〉，《讀書》，1989 年第 12 期，頁 111-118。
- 楊懷志，〈桐城派研究之回顧〉，《斯文》，輯 5，2020 年 4 月，頁 159-176。
- 暴鴻昌，〈論方苞與康熙時期的理學〉，《中國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157-165。
- 蔡長林，〈從「文學」到「文人」——漢代「文章」的經學底蘊〉，《東華人文學報》，期 10，2007 年 1 月，頁 51-80。
- 顧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論及其歷史地位〉，《江淮論壇》，1982 年第 2 期，頁 48-55。
- Chiu, Wei-Chun. "Morality as Politics: The Restoration of Ch'eng-Chu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

Neo-Confucianist Tongcheng, Literary Tongcheng: Fang Zongcheng's Circ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hiu Wen-Hao*

Abstract

Revolving around a group of scholars in nineteenth-century Tongcheng, Anhui province,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tensions between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nd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s evidenced in their writing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Tongcheng School was renowned for its ancient prose theory and achievements in Neo-Confucianism, largely achieving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Cheng-Zhu thought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proved difficult to maintain. Hidden tensions among early Tongcheng scholars, which would surface as evidenced by Fang Zongcheng 方宗誠 (1818–1888), Su Dunyuan 蘇惇元 (1801–1857), and Dai Junheng 戴鈞衡 (1814–1855) all supporting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were further exacerbated b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s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escribing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and in compiling the writings and chronicles of related scholars, they deliberately elevated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nd suppressed the independence of literature.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spite a gradual fa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Cheng-Zhu thought, such tensions had not yet dissipated. Intellectual descendants such as Wu Rulun 吳汝綸 (1840–1903) pointed to these tensions but attempted to view both traditions in an equal light to free literature from the shackles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By describing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ongcheng scholars confronted, arranged, and reconciled the inherent tensions in the academic resources they had inherited. It also provides alternative clues to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beyond the “Han vs. Song” and the “tradition vs. modernity” binarie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ilosophical meaning and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Fang Zongcheng, the Tongcheng School, philosophical meaning, literary creation,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